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 133 期 (总第 383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12 年 7 月 31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8961988622

编者按：7 月 23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的重要讲话。当前，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我国发展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情况下，如何更加坚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继续深化改革，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要解决这些课题，一个前提条件是，必须保持社会的稳定。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许多深层次问题才能得到逐步解决。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

刚刚召开的全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会议，将“围绕产生不稳定因素的深层次原因，从推动科学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科学民主决策、公正廉洁执法、密切干群关系等方面加强源头预防”、“把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等作为维稳的宝贵经验予以强调，深刻表明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群众权益的内在统一性。

一些矛盾问题发生并不可怕，关键是治标，以求一时之稳，还是标本兼治，彻底化解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思路。本刊特此推出《维稳》专题，供各位领导参考。其他栏目推荐的文章相信也会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要目

●本期专题/维稳

周永康：加强北京等重点地区维稳 迎接 18 大召开

罗志军：以全省稳定为全国大局稳定作贡献

朱小丹：改革不动真格乌坎事件会再现

于建嵘，汪玉凯：摆脱维稳困局，从脱敏开始

●政坛经纬/世界政要畅谈领导力

●国是论衡/维稳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群众根本利益

●历史深处/李固“维稳”

●悦读时光/毛泽东为何下决心要打中印边界冲突之战

●本期专题/维 稳

周永康：加强北京等重点地区维稳 迎接 18 大召开

7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在全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坚定信心决心科学应对挑战扎实做好维稳工作

为十八大胜利召开创造平安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

周永康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认真履行维护稳定的第一责任，实现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在多年探索实践中，各地各部门加深了对维护稳定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创造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一是把握大局、统筹兼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以改革发展促进和谐稳定，以和谐稳定保障改革发展。二是加强领导、齐抓共管。把维护稳定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第一责任，作为各部门各单位的共同任务，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三是源头预防、综合治理。围绕产生不稳定因素的深层次原因，从推动科学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科学民主决策、公正廉洁执法、密切干群关系等方面加强源头预防，综合运用方法措施，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问题。四是掌握政策、依法办事。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严格依法按政策办事。五是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专门机关在维护稳定中的骨干作用，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共同做好维护稳定工作。六是重心下移、固本强基。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切实改进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努力把矛盾问题解决在当地、化解在萌芽状态，筑牢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周永康强调，再过几个月，党的十八大就要召开了。这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举国关心，举世瞩目。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是开好十八大的重要前提，是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首要政治任务和重大政治责任。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借鉴运用多年来办成一系列喜事大事、应对一系列急事难事积累的成功经验，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此，一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民生项目的投入力度，切实做好就业、看病、上学、住房、社保等民生实事，夯实社会稳定的基础。二要着力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以征地拆迁、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涉法涉诉等领域为重点，深入排查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明确责任，合力攻坚，及时妥善化解。三要着力维护国家安全。深入开展反分裂、反恐怖斗争，严密防范、依法处理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捣乱破坏活动，加强首都、新疆、西藏等重点地区的维稳工作，依法、科学、稳妥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全国社会大局稳定。四要着力维护公共安全。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建立健全治安防控体系，有效防范、依法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感。五要着力加强舆论引导。深入宣传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力量引导到谋发展、保稳定、促和谐上来，为维护稳定创造良好舆论环境。

周永康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决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确保维护稳定的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要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到矛盾问题多的地方，深入到困难群众中，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地做好群众工作，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7月17日新华网杨维汉）

罗志军：以全省稳定为全国大局稳定作贡献

7月17日，中央召开全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省委书记罗志军在江苏分会场出席会议，并介绍了我省加强和创新互联网管理的经验和做法。会议结束后，我省随即召开维护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对做好全省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作出部署。罗志军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会议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精神、更加过硬的措施、更加扎实的作风，把各项

维稳工作做实做细，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罗志军指出，做好党的十八大安保维稳工作，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高度重视维稳工作，以全省稳定为全国大局稳定作出贡献。认真落实关键措施，全力以赴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工作制度，从源头上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信访问题。进一步完善“大防控”机制，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和舆情引导，在全省兴起一个争创新业绩、喜迎十八大的热潮。

罗志军强调，要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维稳工作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好维稳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研究部署、亲自组织指挥、亲自督促落实。健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2012年07月19日 扬子晚报）

朱小丹：改革不动真格乌坎事件会再现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围绕“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他在采访中表示，广东将利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稳步推进深层次的行政体制改革。此外，广东即将出台关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建设问题的文件，使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合格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承接者。

通过改革防政府公权力蜕变

5日，在广东代表团开放日上，朱小丹对于改革的论述就曾引起外界关注。在昨日的“亮相”中，朱小丹再次重申了广东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称将通过改革真正形成防范政府公权力蜕变的有效机制。

此前，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曾表示，目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的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审批事项上。朱小丹昨日称，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涉及多个方面，可利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将各项改革全面推进，最终形成政府内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这也是改革的最终目的。朱小丹还称，改革的目的是要拔除那些“小团体”和官员个人随意、随心所欲地支配公共资源，不惜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政弊端。

尽快转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朱小丹表示，社会管理问题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其艰巨和复杂的程度更不亚于经济领域。为了让政府下放的职能尽快被社会组织承接，广东省将于近期出台文件，更好地规范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

去年 11 月，广东对社会组织规范管理推出新规定，降低了社会组织登记门槛。从今年 7 月 1 日起，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朱小丹表示，广东现在加强和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建设，就是为了把那些可以转移给社会组织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尽快转出去，但同时也要花更多的工夫使社会组织成为合格的管理职能承接者。

前不久，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常务会议讨论了两个有关文件，分别是《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和《关于进一步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的实施意见》。朱小丹说，目前正在对文件进行修改，很快将会出台。贯彻这两个文件提出的要求是接下来广东省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新京报沈玮青。作者为广东省省长）

于建嵘，汪玉凯：摆脱维稳困局，从脱敏开始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先驱语录】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

汪玉凯：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

【访谈动机】“维稳”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的关键词。每逢重大活动、重要时期，各级政府就会高度紧张起来。比如上海世博会期间、广州亚运会期间，确保社会稳定都是当地政府的头号任务。维稳投入的经费更是难以估量。

高调维稳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可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真的到了极不稳定的境地吗？不少研究者给予了肯定回答，但是，他们批评的矛头多指向政府的维稳作为。甚至有学者提出，政府的维稳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在不少人看来，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事实摆在眼前。今年 8 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今年 9 月，河南商城县蝗虫疫情导致 18 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

“维稳”。

显然，当前的维稳模式难以持续，“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需要与时俱进。

过度使用维稳手段适得其反

《国际先驱导报》：近来，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尤其强调维稳。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社会背景？

汪玉凯：这是因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社会内在矛盾突出，呈现被激化的趋势。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演变趋势。以前，民众多数都是为了维权争利，运用法律手段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后来发展成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再严重的泄愤就是引发群体骚乱。

换句话说，群众利益诉求以前是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现在却是通过比较激烈的方式。这样的社会背景是政府强调维稳最关键的原因。

Q：如今政府对维稳工作“很给力”，为何社会反而越来越不稳定了呢

于建嵘：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

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汪玉凯：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度依赖警力、依赖外在手段。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维稳思路，但是这样的思路现在却占据了政府维稳方式的上风。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维稳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

其实，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台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那么工人、农民、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在政策中的博弈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话语权，没有利益表达的途径，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稳定

不该把维稳和维权对立起来

Q：国外发生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比如今年的法国工人大罢工，以及英国大学生抗议学费上涨等，所在国政府并没有“维稳”一说。跟中国的情况相比较，当中有何不同

汪玉凯：在国外，这样的事件被看做是正常的利益表达，是老百姓的自由，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了。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我认为，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

Q：这么说来，政府要维稳，民众要维权，两者并不是矛盾的

汪玉凯：表面上二者有冲突，其实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维稳需要在保障老百姓个体权益的基础上进行，否则维稳就没有基础。老百姓是社会的权利主体，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主体服务的，只有维护老百姓的权利，执政才有合法性基础。在维护个体权益的前提下谈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维稳以及保障社会秩序是为了打击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而不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因此，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是维权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对建设和谐社会缺一不可。

于建嵘：在社会转型期，本来应是民众大量“正常”表达意愿的群体行为，却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面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Q：那为何政府当前的维稳方式比较容易采取压迫式的手段

汪玉凯：是的。现在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过于强势，不是从政策上的疏导，而是以压制、出警的方式，造成民众与政府情绪上的对立，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把问题复杂化。现在网络的传播效应如此之快，很容易把小问题放大。

于建嵘：刚性稳定就是以压力体制为基础。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因此，当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执政者惊慌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

Q：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治理观念是不是值得反思

于建嵘：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以“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来指导工作，现在到了反思这个观念的时候了。我一直在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同时，邓也提到了“改革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

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我们不惜牺牲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我们不惜

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 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当下中国需要“脱敏”

Q：摆脱“维稳”困局的出路在哪里

汪玉凯：首先要调整维稳的整体思路，不要认为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就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

其次，维稳的政策本身有可能存在疏漏，以政策调整来整合社会利益格局，实现利益表达，这样才能化解社会矛盾冲突。

另外，除了利益表达路径以外，通过制度建设均衡城乡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格局，不能用二元政策，征地、拆迁等方面的政策也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以此来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大家均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事实上，这只是政府的过度反应，也是严重的不自信表现。我认为，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敏”。

另外，应该打开司法大门，通过司法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从理论上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主要的形式。必须看到，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当前我们的法院处境尴尬，“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司法地方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同时，可以设立专职人大代表，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我发现，人大代表有一个特点，敢于“骂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对方还不会有太大意见。这就说明了专职人大代表机构可以起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作用。

改革可以先从县开始。比如可以选取几个县，改革试验几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扩大到省，再试验几年。这样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间”换“时间”。万一改革失败了，也不会对大局造成影响。（国际先驱导报）

● 国是论衡

维稳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群众根本利益

在社会转型期,更好实现和维护群众权益,不仅是社会进入稳定发展快车道的“通行证”,更是保证持续前行的“加油卡”。有些地方,只看结果,不讲过程和方式,反而埋下了次生和连锁反应的隐患,甚至滋生出如“黑保安”公司的不法产业链。另一方面,简单地“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花钱买稳定”看似很“省事儿”,却会误导民众对维护合法权益做出错误的理解和预期。这种解决矛盾问题的方式,是“锯箭杆”式疗伤,病灶并未根除。这些都不是真正站在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解决问题,而是“眼前无事即是平安”的短视行为。

一些影响稳定的事情发生,往往源于群众的切身利益、现实利益受到侵害。对于这种情况,仅靠末端处置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加强源头治理,把不稳定的“病根”挖出来、去除掉,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当然,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一些政策和措施原本是“为群众办好事”,却因种种原因受到误解,甚至成为引发矛盾的导火索。这种时候,我们的态度决不应是抱怨和委屈,而要从自己的角度多加反思: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充分征求了群众意见,是不是决策者的一厢情愿?作为公正处置的第三方,在交通肇事或医疗纠纷中,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耐心和有技巧地释法和调解?在维护和实现群众权益时,只有把各种困难和问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项部署和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才能让群众又满意又贴心。

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群众根本利益。认识到这一点,在化解矛盾问题的过程中,就应该时时处处体现对群众各项权益的尊重,不可有丝毫“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粗疏和缺漏。中央之所以一再强调公正、依法、科学、稳妥处置,就是要求执法者在维护公共秩序时,首先保证自己有良好的秩序;捍卫社会公正时,首先展示自己能处事公正;打击违法行为时,首先严格自己依法守法。这样的维稳,才能最大限度维护群众权益,也才能成为群众共识。

从瓮安到孟连,当初的“疑难杂症”现在已经“药到病除”,并形成治理的经验。各地的维稳实践探索告诉我们,维护群众权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维护稳定的过程应成为维护权益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应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复杂挑战,为改革发展创造平安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

一位常年接待群众上访的市委书记,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办好实事中化解了不少矛盾,增进了一方和谐。他说:“最高兴、最幸福的时候,是人家喜欢你、记住你、想念你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稳与维权在实践中高度而辩证地统一了。(人民日报)

世界政要畅谈领导力

马哈蒂尔：时间构想关注贫富差距

日本《读卖新闻》题：马哈蒂尔谈领导经验

执政三大要点

在民主国家，政治领导人需要的首先是时间。就任第一要熟悉各种情况，第二要研究政策，到了第三年才能够开始实施。如果隔一两年就换人，是培养不出领导人的。通常应该给他们三四年的时间。

我担任马来西亚总理长达 22 年。在第一任内首先遇到了执政党内政敌的挑战，虽然最终遏制住了对方的势力，但未能出台能给我带来良好变化的政策。真正能实施政策的是在第二任期。

民众急于求成。特别是在一些新兴的民主国家，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多选民认为投票仅仅是为了推翻政权。如果每次选举都要更换政权，那么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只能把全部精力用于维护政权，根本无暇顾及国家的大政方针。

其次需要的是构想。领导人一个人的视野很窄，即使犯了错误，自己也不容易意识到。应该多听取他人的意见，并加以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构想。

二战后日本的复兴和高速经济增长令我感到惊讶，因此我提出了“向东看”的设想，主要是学习日本。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国民拼命工作，遵纪守法，对产品的质量高度负责。英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复兴却用了较长时间，因此我们没有把英国作为榜样。我们努力学习日本的职业道德。虽然做得还很不够，但已经促进了我国的发展。

第三需要关注贫富差距问题。贫富差距到了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引起纠纷。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由马来裔、华裔和印裔组成。如果“马来裔都是穷人、华裔都是富人”成为一种固定的看法，那么就会导致民族关系的紧张。

为了缩小差距，我们对马来裔实行了优惠政策。在 1997 年的亚洲货币危机中，邻国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针对华裔的暴乱，结果导致苏哈托政权垮台。我认为我们优待马来裔的政策是成功的。

提倡“拿来主义”

我们以日本为榜样，学习尖端的技术，使产业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但日本在政治上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政党和派系林立。各派系不关心国家政策，首相整日忙于与党内其他派系周旋。这或许是日本首相位置不稳的原因。

我从历史上的领导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向阿拉伯民众灌输善恶理念，改变了人们的状态，为阿拉伯文明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彼得大帝提倡向先进的西欧国家学习，使俄罗斯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变成了一个强国。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也吸收了西欧最先进的东西，使日本变得强大。

同时代的领导人当中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对于那些将他送入监狱的人，他并没有怀恨在心，而是与他们携手建设自己的国家。我曾经与曼德拉会面，受到很深的启发。

优秀的领导人首先应该具备改造自己的能力，其次才能改变他人。国家会因此而变得富强。

接受中国富强

而今，欧美在全世界开始走向衰落，中国则异军突起。

欧美在制造业方面失去了竞争力，试图依赖虚拟的金融市场赚取巨大的财富，最终惹祸上身。欧美要东山再起并不容易。工人工资很高，劳动时间又短，过度的社会保障导致了竞争力的丧失，不过要降低这种水平是很困难的。此外，欧美制造业的工人已经丢失了重要的技术。

当今世界有人认为中国是个威胁。美国担心中国会取代其霸主地位。不过，如果国际社会对中国构建包围圈，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那么中国就会越来越不满，并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东亚局势的紧张不是一件好事。我想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

我们应该接受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富强国家的现实。一个富裕的中国能够给我们带来利益。马来西亚过去有一种说法：“如果每个中国人每天都用一勺棕榈油，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变得富有。”如今中国从马来西亚进口大量油料，让我们受益匪浅。

富裕的中国将会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如今全球各地到处是中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民主政治难以保证国家的繁荣，那么中国的威权主义或许会更具魅力。（鹤原彻也）

基辛格：勇气品德不可或缺

【日本《读卖新闻》1月31日文章】题：基辛格：领导者需要“51对49”的决断勇气
重要国家产生新的领导人时，整个世界会极为关心此人在思想、性格等方面与前领导人有何不同。在美国和中国这样具有强大影响力国家的领导人更迭时，更是如此。

当一种决策行为需要考验领导能力时，通常意味着很小的选择余地。这不仅是因为对象事件本身极为复杂，还因为事情往往让人左右为难，领导人所需决断的事情往往只是在“51对49”的局面之间。去年日本领导人应对核电站事故时进行的那种决断，可以看出此类决策的困难性。日本如今就面临用过去方法难以解决的新危机。

拥有长远视野

我认为，领导人最不可或缺的品质是“勇气”和“品德”。在当前的危机中，勇气意味着敢于选择前人未开辟的道路。在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后，选择何种方式应对，甚至仅仅是明确有何种选项，都要花费很长时间。而“品德”将赋予领导人在困难面前不屈服的力量。

最近时常有人问我，日本六年来更换了六位首相，这是否说明国家领导人的领导力量薄弱？但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制度的薄弱。

一个社会的制度中，应当有“用一定时间进行选择”的机制。这一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还必须加以固定。在很多国家，宪法规定国家领导人的任期时间固定。在议会制的国家，很多都要进行定期选举。而日本国会的党派种类繁多，政局风向稍有变化就会导致领导人更迭。

当今世界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日本也不例外。而且，日本还面临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和核事故处理问题。要克服这一困难局面，领导人必须拥有长远视野。

日本有长期稳定的官僚制度，无论谁成为首相，官僚系统都可照常工作。在美国政府，总统更迭将导致 5 千人左右的职员更换，仅有国务院的制度与日本相似：国务院中外交官组成的部门在政权更迭后也仍可照常工作。

作为曾经担任过国务卿的人，我知道，官僚们如果接到了他们不认同的指示，就会认为国务卿并未理解自己以前就此问题的说明。他们之后就会拖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而他们的武器是了解政策内容并熟知行政程序。

具备足够知识

一名内阁成员如果要避免这种问题并充分发挥官僚的能力，就必须拥有自己明确的政策方针。因此，他必须具备足够的知识，下达适当的命令，还必须了解一件事情是如何决策的。

我和 10 位美国总统共过事，还认识另外的两名总统，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素质。

尼克松总统是外交方面的专家，外交是他的兴趣所在。他与我的组合获得了成功。我们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并且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作为总统，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等事务上作出了重大决断。但是，与其他政治家相比，他未能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

福特总统是领导人中的特例。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总统，因此不像其他总统那样关心舆论调查结果。不过，在就任之后，他非常扎实地工作并有所成就。

现代政治有很多极为复杂的问题，即使想成为总统，也很难做好充分的准备。民主程序也比以往更为复杂，选举时间更长，可供候选人用于学习的时间在减少。在美国，年轻候选人越来越多，因此用于学习的时间更少。一方面需要学习，另一方面政治家们更年轻，更缺乏经验，其结果就是政治上有急于求成的倾向。

在外交政策方面如何呢？观察美国的对华政策便可知，自尼克松总统以来，8位总统的对华政策本质是相同的，即不与中国敌对而保持接触。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与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在竞选期间都曾表示要改变对华政策，但他们上台两年后，就又回到与前任相同的方针。这是因为客观现实会给政策带来一定的必然性。

今后，美国还将更为努力地与中国构建合作关系，而中国在对美关系上也会付出同样努力。这是由于世界出现了众多新问题，其中一些甚至用传统方式难以归类。如果美中两国对立，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将必须挑选其中的一边“站队”，这必然会造成国际环境严重紧张。日本也应当与美国一起提倡“合作政策”，积极建设采用谈判而非军事压力解决矛盾的国际秩序。（饭塚惠子）

中曾根康弘：面向世界改变未来

【日本《读卖新闻》2月1日文章】题：中曾根康弘：对过去和未来的责任感

随着主要国家陆续举行换届选举，今年无疑会成为世界性的转折期。各国国民希望由有见识、有执行力的人才担任新的领导人，引领国家跨越这一转折期。对于日本来说，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亚洲太平洋战略以及推进战略的领导人和政策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也一直以提升日本国力、构筑亚太地区和平的基础为目标。当时，为了制定必要的对苏战略，本人积极致力于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人情味和个人魅力

1983年1月，我作为首相首次访问了美国，与里根总统一见如故。我们在正式会谈前进行了20分钟的谈话。经过白宫的走廊时，里根总统问：“我们可以用‘罗’、‘康’互称吗？”我回答“可以”。“罗·康”关系由此产生。

里根总统非常包容、具有大局眼光且平易近人，和我有不少相同点。一个领导人有人情味和个人魅力是十分重要的。当年威廉斯堡峰会召开之际，法国总统密特朗因不满于位列美国之下，对在欧洲部署导弹的计划唱起了反调。作为新人的我说服了密特朗总统，使峰会取得了成功。里根总统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本人的世界知名度陡然上升。

一个首相所具备的条件是，拥有引领国家发展的强烈信念及对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国民的责任感。我经历过战争时代，一直在关注世界和本国的发展。我们从“亡国的深渊”中崛起，但现在的人们可能是因为从“繁荣的山冈”起步，历史认识较为浅薄。

构筑“命运共同体”

不少首相在当选后前来会见本人，我对他们谈过两点心得。

其一，必须尽快在党内构筑“命运共同体”，将休戚与共的人联合在一起。前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和前干事长金丸信曾与我是“命运共同体”。

其二，通过峰会等平台寻找可以合作的国家领导人，通过写信等方式促成相互合作。外交是没有武器的战争。我当时是带着上战场的紧张心情出席国际会议的。

日本在6年内换了6名首相。这是由于缺乏经验引起的。近来的阁僚人事给人一种事务性分配的印象。实际上，首相进行的并非“政治行政”而是“政治战争”。因此，在阁内选择志同道合者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此外，近来的首相对非常事态的觉悟也十分欠缺。有志成为首相的政治家必须从平时就锻炼自己，对应对战争和天灾等危机情况的方法了然于心。前首相菅直人并没有充分进行自我锻炼，没有成功地应对东日本大地震。

立志引领国家实现战后复兴而成为政治家的人，与从自身经历出发选择成为政治家的人，两者存在相当大的不同。前首相菅直人是因为机缘巧合当上了首相，但其市民主义思想依然存在。市民主义主要是以谋求“现在”的市民的幸福为中心，不涉及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在我看来，野田首相对历史和传统也不是特别关心。民主党政权的首相的历史观都比较淡薄。

一个政治家必须具有改变世界、面向未来的气魄。明治以来有名的政治家都具有这些特质。（林博英）

●历史深处

李固“维稳”

东汉顺帝时期，荆州盗贼纷起，经年不能平定。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朝廷任命大将军李固出任荆州刺史。李固到任后，首先派出官吏到各郡县慰问，以安定民心，同时与盗贼接洽和勾通，之后下令盗贼只要出山重新做良民，以前的行为一律不予追究。他的这一政策，一下子抓住了人心，迅即瓦解了盗贼的“心理防线”。盗贼闻讯后，首领夏密等人率六百余大小头目，均将自己捆绑起来，向官府投降。李固严格执行政策，一律予以宽赦，让他们回去互相招集，宣扬朝廷的声威和法令。半年之内，其余盗贼全部归顺，州内清平（《资治通鉴》卷52）。李固下车伊始，以他的魄力、远见和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实施了一次非常成功的“维稳”。

李固为什么要对盗贼们既往不咎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荆州何以会出现这么多盗贼，而且越剿越多。这要先从朝廷谈起。顺帝和之前的安帝及之后的桓、灵两帝，都是昏庸之辈，在位期间外戚飞扬跋扈，宦官为所欲为，皇权、相权基本上被这两大恶势力所肢解和挟持，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与李固同朝的梁冀，是汉顺帝的大舅子，此人左右皇权，骄横凶蛮，连皇帝都让他毒死了，是朝中最大的恶势力头子。因此，“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朝政成了一帮小人、恶人和贪官酷吏肆意释污秽的大泥坑。在这样的背景下，老百姓过的啥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全国各地盗贼蜂起，绝不仅仅是荆州。此时，刚刚崭露头角，以后成为东汉名将的皇甫规，用“从乱如归”来形容这种乱局。即由于不堪忍受，人民“投奔乱匪的心情，犹如还归故乡一样的迫切”。与李固同时派到广陵郡任太守的张纲，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张纲也采用了招安之术，他对盗贼首领说，过去历任广陵郡太守，“多肆贪暴，故致公等怀愤相聚”，这些二千石的太守有罪也。张纲所言，也道出了荆州盗贼多的原因。夏密那些人，并不是天生的土匪，套用毛泽东常讲的一个比例，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是顺民，之所以铤而走险，聚众为盗，实在是苛政下无法生存了，万千条路只剩下了做盗贼一条路。其实，做强盗远离土地，居无定所，粮无出处，打家劫舍，坏了良知，哪是人过的日子。夏密等六百余人闻听“好政策”后，便自我捆绑向官府自首，说明他们是多么渴望离开绿林，过上正常的平民生活。他们的要求就这么一点点，套用今天的一句话来评价，同样是“中国的老百姓多好啊”。李固是东汉一位难得的直臣和清官，忧国忧民甚切。他深知当朝之弊之恶，这些为盗的子民多为恶政所催生，故才审时度势，以民为本，抓住了事情的本质，采取了高明的政策。李固可赞也。

不过，假如李固仍取前任之策，视大批盗贼为欲颠覆政府的敌对势力，以“汉贼势不两立”的强硬态度，务必要除恶务尽，那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只会激起夏密和部众更大的仇恨和反抗。道理很简单，官府原本就欠他们的账，说不准有的是被贪官夺了良田，有的是被冤死了亲人，有的是被逼得无家可归……这些被逼做了强盗的人，胸中早有一本“血泪账”。如今，犯罪在先的官府又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剿灭他们，最终只会逼使他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对官府作最坚决的抵抗。结局只能是官民两伤，尸横遍野，没有赢家，徒使无数生命和资源化为灰烬，徒使社会矛盾更加剧烈和激化。只有蠢人才会采用这种下下之策，高明的李固不为也。

这件事还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假如一地只出了一个或几个盗贼，那么，应该是这几个人问题；假如到处都是盗贼，那就不是盗贼的问题了，而是统治者的政策和机制出了大问题。应该检讨的，首先是政策。如果只治盗贼而不检讨政策，那只会导致恶性循环，乃至盗贼越

剿越多，最终社会出现重大危机，军民都付出更惨烈的代价。(西安晚报 刘吉同)

●悦读时光

毛泽东为何下决心要打中印边界冲突之战

核心提示：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

四十多年前，在祖国西部边疆，曾一度狼烟四起、风声鹤唳。印度政府置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于不顾，悍然挑起一场大规模侵犯中国领土的战争。中国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短促而有限的自卫反击战，全胜收兵。自此以后，西部边疆保持了数十年的相对稳定。当年在中国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了这场反击战。当战斗硝烟渐渐散去，西线恢复平静，毛泽东回首战事，不仅感慨道：“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我们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

凡事总有一个过程。中印边界冲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早在建国之初，即便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方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1951年，印方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印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态度。1954年10月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的隆重接待。毛泽东对尼赫鲁谈中印友好的同时，也谈到两国间的分歧，当面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这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两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这段话，于1959年5月间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转达给了印度方面，等于向印度交了“底”，目的就是一个，希望印方自重，和平共处。

但是印度当局对好言相劝置若罔闻，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双方军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冲突。

一向视领土为血肉的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尽管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他还是愿意向他们客观地通报情况，以便得到他们的理解。

10月2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中方出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苏方除赫鲁晓夫外，参加会谈的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会谈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印边界冲突问题。

赫鲁晓夫好似公正地说：“你们中国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发生中印边境军事冲突是不对的。由于领土争执而发动战争是不值得的。”

后来被赫鲁晓夫诬称为“中共放出来的一只虎”的陈毅首先站起来反驳：“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军队越过其边界，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边境内建立哨所，向中国边防军开枪。”

周恩来也不客气地补充说：“印度开枪射击6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还击，怎么能说是中国挑起的呢！”

陈毅接着气愤地指责赫鲁晓夫：“你们9月9日发表的那个《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

赫鲁晓夫抵赖：“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打死了他们的人。”

陈毅：“我们9月6日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9月8日你们跟我们说拟发表《塔斯社声明》，我们劝你们慢一点，并且告诉你们，我们中方也要发表一个文件，请你们看了我们的文件以后再表态。退一万步说，就算像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情况，那么你们也应当慎重些，等弄清情况再表态。但是，你们根本不听我们招呼，急急忙忙抢先发表了你们的《塔斯社声明》，这是为什么？”

双方你来我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满脸涨得通红，指手画脚起来：“我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

陈毅眼睛瞪得溜圆，怒不可遏：“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并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周恩来表态说：“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周恩来再三强调，“中方对印度一直采取团结的政策，但对它

不讲理的地方，对它违反国际公约的事情，则要反对，要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着要团结它，不能一味迁就它。”

陈毅紧接着说，《塔斯社声明》就是迁就主义。赫鲁晓夫越加激动，指着陈毅叫起来：“我怎么会是迁就主义？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又引起陈毅、彭真尖锐的驳斥……

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闭口不言，他厌恶赫鲁晓夫的做法，知道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只是到会议快结束时，他才很克制地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毛泽东讲话一板一眼，表情严肃，但语气委婉。

如此，赫鲁晓夫只好吐了口气说：“既然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会谈终于不欢而散。两天后，赫鲁晓夫一行离京回国。

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海参崴后，10月6日发表演讲，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再一次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这表明，赫鲁晓夫对中印争端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毛泽东几经权衡，终于定下“打”的决心

1959年11月，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会议在杭州举行。参加杭州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胡乔木等人。会议主要讨论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和流血事件。会议首先由总参谋部的雷英夫汇报一个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并说明，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提出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例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毛泽东听着汇报，面色肃然地抽着烟。

当雷英夫讲到一些部队避免冲突的困难和一线指挥员的要求时，毛泽东摁灭了烟蒂，插话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还不干，我单方后撤。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

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

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竟拒不接受，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剧了在中印边境进行的武装挑衅。在尼赫鲁拒绝中方建议之后，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决定：中国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境后撤20公里。

1960年1月，中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

中国军队的这一系列措施，在国际舆论界反响强烈，普遍认为中国军队所具有的忍耐和克制，是着实让人惊叹的。

自从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20公里，已快两年了。两年来，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1960年4月，周恩来飞赴新德里，同尼赫鲁举行边境问题高级会谈，尼赫鲁态度无丝毫转变，再次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那是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大小的中国领土啊，中国政府岂能拱手相让？1961年，中国政府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实行隔离政策，均被一一拒绝了。进入1962年，局势越发紧张起来。

6月，印度军队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推进”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截至1962年8月底，印军在中国境内部署了100多个据点。这些据点最近的距中国哨所几十米甚至几米远，形成“面对面”的对峙，有的楔入中国哨所之间，有的还插到了中国边防哨所背后来了。印度军队一步逼近一步，显然要打上门来闹事了。

1962年10月18日，由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它将对中印边界问题做出重大的决策。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等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同时有关将领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雷英夫参加，外交部的章汉夫和乔冠华也到会。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要乔冠华和雷英夫报告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

他俩汇报完，周总理接着发言，他着重分析了有关中印边境问题的形势，说明从各方面看我们不进行自卫反击不行了，因此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会议在作了深入的分析讨论之后，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

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完，会议便接着讨论中印两军的实力对比和能否打得赢的问题。

张国华在参加完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留在内地养病。生活刚刚平静一点，就被中印边境冲突打乱了。中央领导和军委总部不时传唤他。

毛泽东问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

张国华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大家在对形势作了一番分析研究之后，一致认为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但毛泽东一再提醒大家，我们没有同印度作战的经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这一仗。

至于反击作战的方案，同意总参和张国华司令员共同拟制的计划。

根据总参提出的建议，反击时间为10月20日（即这次会议两天以后），前线总指挥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

离开颐年堂前，陈老总和贺老总都向张国华详细了解边防备战情况。

张国华话不多：“我们已按主席说的边防部队在精不在多，作了调整。要打就是泰山压顶之势。”

陈老总和贺老总交换了想法，用他所特有的四川口音，响亮地说：“要挑兵选将，干部不仅要军事上行，而且要有政治头脑，又要勇敢。”

贺老总的烟斗吱吱地冒着烟，他用烟嘴的一头点着张国华说：“如有临阵脱逃的，就要像内战时期那样，抓回来，执行战场纪律！”

张国华在笔记上快速地作着记号，插空提出他的建议：“我想不仅要准备反击入侵印军，还要准备打击逃往尼泊尔境内叛匪的回窜。”

张国华又就兵力、干部、物资和思想准备提出自己的看法。

很快，一支代号为四一九部队的作战指挥机构组成了。中央的决心定下之后，张国华准备飞临前线，具体指挥中印边境东段达旺方面的自卫反击战。出发前，中南海召见他。

中央常委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站在巨幅地图前，一手夹着烟，另一只手作了个搂的手势，说：“我们插进去，不打。”他变换了一下姿势，像是自言自语：“21 平方公里，2000 多人，作个愿望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办不到。”烟头连续亮了几下，他沉思良久，忽然喷出一口浓烟，指着印军据点大手劈了一下，同时提高声音说道：“扫了它！”

说完，他自己也露出笑意。其实，毛泽东为打与不打也犹豫了好几个夜晚。顾虑是尼赫鲁当时声望很高，军力相比又是弱者，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的国家的同情。总参谋部发布作战预令后，毛泽东仍在考虑打不打的问题。在分析了尼赫鲁最大的王牌是中国不敢打他后，反而坚定了打的决心。同时中国将打算告之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仍持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并没有公开地表示反对，还向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也得到了类似情报，如果中国遭到进攻，反击是自然的事。而美国已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对苏战争上，不能以很大力量援助印度。中国外交官们也正向第三世界游说自己的观点。此时的反击对中国是有利的。

总书记邓小平补充：“要争取时间。”他又侧过脸问张国华：“粮食够不够？”

张国华回答说：“光军区生产的粮食还有两亿多斤。”

邓小平很满意：“好，这是有战略眼光的。”

军委秘书长罗瑞卿问道：“你有没有把握？”

张国华爽快地答应：“有。”

“根据呢？”

“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未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高山……”

常委会一直开到深夜，领袖们从大略方针谈到枝末细节。张国华一边强记，一边又要提供情况，散会时，头已疼得要裂开似的。高血压病又犯了。他不吭气，很快登上飞机。

10 月 18 日，张国华到达拉萨的当天，军区常委扩大会议紧急召开。先由军区参谋长王亢传达中央指示：“首长认为这次作战像平型关战斗一样，意义重大。打得要狠，打死了还要再踩他两脚。中央确定，前面靠西藏军区指挥，有关战术上的部署调整等事宜，均由张国华司令员决定。过去总部规定在 50 米以外不打枪不再执行。”

张国华站起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学得惟妙惟肖，包括毛泽东用手缓慢一劈的动作。他讲得很快，提了一连串问题后又低声说了几句，看来，这才是他自己要说的主要的几句话：“事关重大，影响深远。我的决心是：准备干掉他 1300 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1300 也好，2300 也好，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大团满员。”将领谈论战斗预想时，总会感到格外地欢愉，即使在下命令：“为了加强指挥，我们都可以下去，必要时，副司令员可以到团里

去加强。”他再次环视会场，话语里充满了鼓动性：“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把自己担负的责任落实下去，负责到底。现在北京就看我们的了，是共产党员表现的时候了！”

毛泽东相信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张国华于 19 日进入前方指挥所麻麻。

战前，指挥所的气氛是紧张的。他有时专心研究地图，有时离开地图踱着步子深思。“慎重初战”是个很不好驾驭的车头。初战必胜又是最起码的要求。与印军毕竟是初次交手，它是“太极派”，还是“少林派”呢？估计不会有国民党的主力强，但也不能估计过低，要猫当老虎打，像对付国民党的中等部队。当时上级有一种意见，为了慎重，只打敌其一点，吃掉敌人一个营。这是个很保险的方案。张国华考虑再三，吃掉一口营，不痛不痒，要吃就吃它一个旅！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另一位领导时，另一位领导浑身震了一下：“这太冒险了！万一……”

还有一位领导不无担心：“现在仗要打大了，是不是战役发起时间向后推迟两天，以便部队做好充分准备？”

张国华没有表态：“看看部队准备情况吧。”

阴法唐政委代表新组建的四一九部队师团两级领导再次进言：“张司令员，战役发起时间不能推迟！”

“理由呢？”张国华不露声色。

“我一万多人进入战场，在森林里隐蔽了一天一夜，不动烟火，再推迟两天很容易暴露作战意图。那时再进攻还有什么突然性！”

张国华一拍桌子：“不再推迟，要让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两种意见反映到中南海。有的领导也认为张国华是冒险。毛泽东不喜欢墨守成规，把另一种意见的文稿推到桌子另一边，颇有愠色：“他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方案定了，干部会上，他激越的声音把出击前的喧闹压下去了：“现在当面敌人不是 1300，而是 2500，准备打它 3000，如再增援就按它 5000 打。3 至 5 天解决问题，不要怕伤亡，准备伤亡 2000，要打得好，打得快，速战速决，务必全歼。打起来不受‘麦线’约束，但要报告中央。打不好是前边的人负责，补给不好是管后勤的人的责任。哪个搞不好，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打不好，消极说法是未完成任务；积极说，是不够共产党员条件。”

会后他毛泽东布置，要多准备些猪肉，要把各团电影组组织起来，把军区文工团调来前方，以励士气。

10月20日7时30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解放军的炮火铺天盖地地向入侵克节朗的印军阵地倾泻，到9时30分，印军的第一个据点被攻下。到晚上8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张国华耸耸肩，笑了：“这样容易取得的突然性，我当兵33年，还是头一次！”

23日，中央致电称赞：“作战部队在高原严寒的困难条件下，斗志昂扬，艰苦卓绝，勇猛作战，干脆地歼灭了敌人。”军区前指刚刚收到这一鼓励电，还没来得及转发，又收到中央收回该电的通知。张国华心口一紧：出什么事了？等他收到第二份电报时，心中的疑团还是没有解开。后一封电报只比前一封电报多了两句话。一句是“捷报频传”，另一句是颇带感情色彩的“中央、军委极为高兴”。为什么又收走前封电报呢？张国华估计，看这口气，很像是毛主席亲自加的两句话，毛泽东的高兴溢于言表，他希望电报能更大地鼓励前线士气……是的，一定是的！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指挥的两次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歼敌三个旅，生擒包括王牌旅长达尔维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敌7000余人，占整个中印边境反击战战果的80%。中方作战部队也付出了代价，伤亡1460人。重要的是，在和平时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战后，许多战斗骨干被输送到其他部队。1963年，张国华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中央警卫团抽调了12名参加过战斗的连排长。

毛泽东的结论是：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1963年2月，张国华回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秘书通知他，主席要亲自听他汇报。张国华有些发怵：“叫别人汇报吧。”

“不行，主席点名要听你讲，说你一直在前线，最有发言权。”

张国华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主席听部下汇报时，最喜欢插话提问，即兴发挥。他生怕哪个细节疏漏，对答不妥……也只好加紧准备汇报提纲。准备完了，他还觉没把握，就把提纲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阅。罗秘书长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此件看了，很好，请照此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

2月19日下午，汇报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他走向怀仁堂讲台时，那安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他射来，对着他笑。他朝左边一看，又朝右边一看，自己的座位竟被安排在两位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中间。他也记不得是怎样走到自己座位上去的。只记得人在太紧张时反而抛弃了一切杂念。他开导自己：麦克风又不是机关枪，怕什么！反正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就照直说。

他谈到有些部队参战太仓促时，毛泽东果然插话说：“那个五十五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一到就打。一三〇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一到就打，就在汽车路上做动员工作，很仓促。”毛泽东一指张国华说：“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

毛泽东鼓励张国华继续说。当他说到“这场斗争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时，毛泽东又愉快地插话：“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省委的同志都要准备打仗，要练兵，每年要有8个月。”毛泽东侧过脸，笑咪咪地望着张国华半开玩笑地说：“你也是书记嘛！一打仗，你那个病也就好了。”毛泽东磕磕烟灰，又补了一句：“当然有病还是要治的。”

张国华接着说：“中央军委和总部在作战中的每一重大转换时节，都给我们做了及时、具体又详尽的指示……”

毛泽东插话：“我这次是参战了的。还有少奇、总理、小平……”

张国华汇报说，这一次打近战多，毛泽东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对帝国主义，我不相信近战、夜我搞不你不赢。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夜战，怕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公尺或者一百公尺这样的射击。”

张国华：“在交通运输上，我们是依靠土法，依靠自己，依靠群众。没有空军支援，靠地面；没有公路，靠人、畜；没有体积小、重量轻、有营养的干粮，靠糌粑……”

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他是现代化，我们是原始化。但革命的原始化战胜了反革命的现代化。”

最后，毛泽东高屋建瓴地评价中印边境之战：“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

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事实上，从1962年至今，四十多年了，中印边境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取得与这一仗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这一仗，是难以维持这么长的和平稳定的。

不久，罗瑞卿将参战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情况向毛泽东详报。毛泽东若有所思：“过去岳飞说过，‘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前两句有片面性。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文章摘自《红墙见证录》 作者：尹家民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官员读书：意义在书外

在官场的功利主义之风大炽的今天，官员读书往往急功近利，形形色色的成功学、厚黑学、官场小说不断地向官场输送权力秘笈与职场指南。在这种背景下，又有多少官员怀揣纯粹的读书心态享受阅读快乐呢？

位阶哪怕很高的官员，在读书的时候，也只是普通的读者。大概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官员的缘故，所读的文章就成了官样文章吧。让官员们做一个普通读者，带着平常心，享受读书的快乐，欣赏书中的情感和智慧之美。

官员读书，本不该是一个问题。中国素有“学而优则仕”的优雅传统。曾多时，读书是为官的敲门砖。传统中国的科举取士为读书人进入庙堂打开了制度通道。那些有读书能力的人才能获得为官的通行证。像范进、吴敬梓之类的科场失意者，只能被挡在庙堂之外。“学而优则仕”的官员，进入官场，自然也会延续着读书的习性。因此，在传统中国的官场上，尤其是在文官制度坚挺的时代，不读书问题应是一个伪问题。

但是，在眼下中国社会，官员们读书俨然成了一个真问题。《人民论坛》杂志曾做了一个关于党政干部阅读状况的调查，在“每周读书时间”的问卷中，33.4%的受访干部答曰 03 小时，27.6%的为 36 小时。也就是说，在一周之内，有 6 成以上官员读书的时间竟不到 6 个小时，连 168 小时的零头都不到。这里还不考虑官员们在有限读书时间内究竟读的是什么书。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日理万机”的官员个个都成书呆子，手不释卷，坐拥书城，成为文化 GDP 的主要贡献者，但在官场出现大面积的不读书现象，也是不正常的。眼下，“读书无用论”虽然没有明火执仗地又写在官场门楣上，但它甚为流行。流风所及，影响远于官场之外。官员毕竟不同于一般黎民百姓，他们属于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其行为举动具有显性的示范效应。眼睁睁地看着公仆们举止粗俗，斯文扫地，雷人雷语不断刷新公众的围观记录，人们心里该作何感想？

为什么在官场中流行“读书无用论”？因为读书不是“硬约束”，不是官场的“规定动作”，而是一种“软约束”、“自选动作”。如今的官员们很忙，但功夫在书外。很多官员忙于公务，忙于钻营，忙于应酬，忙于实打实的“硬指标”。如果在哪一块有缺项，就是实实在在的窟窿，若不及时补上，“后果很严重”。相比之下，读书则是一个“软指标”，没有外在的测度标准，依官员个人的旨趣或柔性偏好而定。在功利主义的官场，读书缺乏外部性的激励。读书或者不读书，看上去与官员的政绩没有明显的正相关。既然读书无用，何苦要有案牍劳形？不读书照样混得如鱼得水，读书的动力何在？失去外部激励，读书自然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相对于那些不读书的，读书的官员该算难得了吧？我看未必，这要看他们读什么，怎样读。既然读书是官员的“自选动作”，他们就有权支配自己的书架，书架上放什么书，床头边

翻什么书，应该是官员自己的权利。官员的读书动机，往往受到两大因素驱动：一是趣味，二是利益。趣味有高下，利益有分殊。不同品味的读书趣味，不同方向的利益取向，会影响官员的读书选择。3月19日《人民日报》曾刊文《领导干部该读什么书》，披露贪官的读书菜单与他们的贪腐行为存在相当的关联度。比如，胡长清喜看《肉蒲团》、《金瓶梅》，而辽宁沈阳原副市长马向东钟情于《赌术精选》、《赌术实战108招》。《人民日报》的文章称干部读书不仅是爱好问题，更是严肃的价值观问题。文章在读书与价值观之间作循环论证。读什么书固然重要，怎样读书其实更要紧。在官场的功利主义之风大炽的今天，官员读书往往急功近利，形形色色的成功学、厚黑学、官场小说不断地向官场输送权力秘笈与职场指南。在这种背景下，又有多少官员怀揣纯粹的读书心态享受阅读快乐呢？在世风裹挟下的功利性阅读，会把读书趣味糟蹋掉的。这不仅对官员没什么好处，对社会的污染也很大。你到机场书店去转转，看看书架上畅销的，多是中国精英们钟爱的读物。这些畅销书，多是用欲望书写的东西。

据悉，有关部门向党员干部推荐学习书目已经第6批了，这批学习书目包括5种图书：《论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摘编》、《科学发展主题案例》、《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雷锋》、《幸福就这么简单》。我们丝毫不怀疑荐书的高尚动机。表面上看，有司向官员们荐书，似乎解决了官员盲目读书的问题。问题是，这些“规定动作”，究竟有多大效果？在功利主义官场，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读物有多少能打动被利欲熏染了的心灵？

我们对官员读书不能寄予过高的奢望，要求官员读多少书、读什么书、如何读书，这可能有点难度。还是把官员还原成一个个普通的读者吧。位阶哪怕很高的官员，在读书的时候，也只是普通的读者。大概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官员的缘故，所读的文章就成了官样文章吧。让官员们做一个普通读者，带着平常心，享受读书的快乐，欣赏书中的情感和智慧之美。

（张涛甫。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